

关于全国高教工作会议 的传达报告

——1983年6月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
高等学校干部进修班上

教育部副部长 彭珮云

(根据报告记录整理, 供内部学习使用)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学校干部进修班印

关于全国高教工作会议的传达报告

这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是五月七日到十九日在武汉举行的。这是近几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门研究高等教育工作的会议。到会代表363人，除了国务院各部门和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的领导同志157人以外，高等学校出席的代表，有来自教育部直属学校的，有其它全国重点大学的一部分非重点大学的，共186人。这次会议有一个特点，就是多种形式的高等学校如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短期职业大学、函授大学、农民大学，等等，都有有代表性的学校来参加。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进一步明确高等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研究如何调整、改革高等教育的结构，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如何改革高等教育的领导体制和管理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高等教育的管理水平。高等学校工作中的问题很多，不只是上述三方面的内容。例如，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很重要，今年要专门开会研究。各类学校的教学改革工作，也需要分别召开一些会议来研究。这次会议主要是就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全局性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何东昌部长在会议开始时作了报告，结束时做了总结。

会上发了几个文件，同志们可以组织阅读：

（一）、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

（二）、中宣部、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班子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

（三）、国务院批转劳动人事部、国家民委关于加强边远地区科技队伍建设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

（四）、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等部门关于成立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的请示。

还有一个是中宣部的文件，题目叫《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研究提纲）》。这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对于我们在实践中面临的建设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从理论上、政策上做了阐述，对我们的工作很有指导意义。我建议干部进修班的同志们都来研究一下这个文件。教育部还为会议准备了十八个征求意见稿，都是有关高等教育的调整和改革的。经过会议讨论以后，还要进一步修改，有的还需要和国务院其它有关部门协商，有的需要请示中央。修改定稿以后，再用各种形式发下去。这些征求意见稿，都请代表们带回去了，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会议有两天大会发言，一共有十一位同志发了言，介绍了有关发展高等教育、调整改革高等教育的一些经验。总之，会议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我不可能在两小时以内向同志们传达，因此，我想讲几个主要问题。

一、关于高等教育的形势

总起来说是两句话：形势很好，困难也很多。在十年动乱中，高等教育是重灾区，破坏十分严重。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等教育战线贯彻了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主要表现在：清算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推倒

了两个估计，初步调整了学校的领导班子，清理了“左”的思想影响，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同时，也逐步加强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抵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这样就调动了广大干部、教师、学生的积极性；恢复了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逐步提高；培养研究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我国第一次实行了学位制度，已经授予硕士学位将近15,000人，博士18人；通过培训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教师的业务水平有了提高；科学研究工作也有了新的开展。从1978年以来，我们共派出留学生16,000人，接受来华留学生8000多人，接受来华讲学或从事教学工作的专家、学者3000多人。几年来，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是相当快的。高等学校从1976年的392所，发展到1982年的715所。在校本、专科学生，由1976年的565,000人，发展到1,154,000人。学校数和在校生数，都翻一番。在校研究生，1965年只有3500多人，1982年发展到21,000多人。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也有新的发展，并且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可以说是闯出了一些比较省钱的办学的路子。学校的物质条件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所以总起来看，几年来高等教育战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为我们前进准备了比较好的基础。高等教育形势好还特别表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小平同志自告奋勇抓教育工作起，我们党对于教育工作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党的十二大明确地指出教育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战略重点之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二大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对于教育工作又有多次重要指示。十二大确定我们今后二十年国民经济的发展分两步走，八十年代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准备条件。小平同志指出：八十年代为九十年代的经济振兴作好准备，人才的准备是核心问题。今年三月二日，小平同志指出：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大专院校要发展，近期不说是发展一倍，也可以发展半倍。并且说要拿出一点钱来建设校舍和宿舍。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就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加速发展的设想，这是这次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小平同志指示以后，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都讨论了这个问题。赵紫阳同志还亲自找了何东昌同志和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的领导同志，研究怎样落实小平同志的指示。何东昌同志提出发展高等教育是不是可以采取三条措施：一个是老校挖潜，一个是中等以上城市试办短期大学，还有一个是发展广播电视、函授等另一条腿。赵紫阳同志表示同意。他说：“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有中国特色的。”他要求我们把发展和调整结合起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高等教育。万里同志也找过教育部党组的同志与其它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如何落实小平同志指示。万里同志强调说：“应该要求各地象抓经济建设重点项目那样抓好教育，要各地都多拿出一些钱来办教育。”万里同志这两点意见都写进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计委的报告的通知里了。在一次中央书记处讨论农村教育工作的会议上，耀邦同志说：今后书记处每年要讨论四次教育工作。书记处的工作很多、很忙，还要一年讨论四次教育工作，反映了对教育的重视。今年初民盟的千家驹同志写了信和文章寄给陈云同志，建议增加教育事业的投资。陈云同志在信上批注了意见，认为千家驹同志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他的意见很有远见。后来，千家驹同志又把他准备在财政学会上的发言稿（内容也是强调智力投资的）寄给了耀邦同志。耀邦同志给他复了信，肯定他对国家大事直言不讳的精神，并且把他的信转给了计委姚依林同志、宋平同志，还有财政部王丙乾同志。陈云同志在一次关于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中也指出：把钱用在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待遇上，爱护这些人才，应该看作是最基本的基本建设。这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我们请了四位大学的名誉校长参加。他们是南京大学的名誉校长匡亚明同志、浙江大学的名誉校长刘丹同志、天津大学的名誉校长李曙森同志和大连工学院的名誉校长屈伯川

同志，这四位都是我们教育界的老前辈。他们在会议中间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将五十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小平同志看到了这个建议，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请紫阳同志、依林同志考虑提出意见，再在书记处议一议。紫阳同志也很重视，要计委、教育部研究提出意见。我举出这么一些事，还可以举出很多事，象最近乔木同志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大会上代表中央、国务院作了重要讲话等等，这一系列事情都反映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是很重视教育的，这就给全党做出了榜样。这次会上福建省和煤炭部的同志介绍了福建省委和煤炭部的领导同志是怎样重视教育事业的，他们是怎样认识的，特别是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两个发言在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映。我们在最近一期《中国教育报》上登了这两篇发言摘要，请同志看一看。因为内容都发表了，我就不再讲了。这是地方上和部门领导同志重视教育的两个突出例子，实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部门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许多事实说明，尽管现在我们全党对教育的认识还是很不平衡的，需要做许多工作来克服轻视教育、轻视知识和轻视知识分子这些错误思想，但是，总的来看，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了。所以，我们认为现在高等教育的形势很好。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高等教育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还需要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清除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几年我们都在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这个后果，并不是在短短几年里就能解决的。我们还要解决高等教育的现状，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yêu求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高等教育的规模比较小，结构、层次不够合理，科系、专业比例失调。象财经、政法、管理等等科类的学生比重过小，这就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高等学校培养的学生，无论在思想觉悟、知识、能力和体质几个方面都还有弱点，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概括地说，我们培养的人，数量还太少，质量还不高，品种还不对路。高等教育在管理上也存在很多问题，对于高等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在一些方面统得过多、过死，不利于发挥部门、地方和学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存在比较分散的问题，这就使得一部分学校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发生了重复设置专业，浪费人力、物力的情况。从学校内部来讲，高等学校干部的“四化”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学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阻力比较大，高等学校教职工队伍臃肿，结构不合理，青黄不接，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相当普遍，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而解决这个问题又和人事、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紧密联系。这方面的问题是相当多的。高等学校的后勤工作负担也很重。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需要加速发展，也需要加强管理，统一规划，进一步明确它的培养目标和办学的特色。在办学条件方面，近几年来，高等教育事业费和基建投资虽然有一些增加，但是由于在校学生成倍增加，加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比较多，至今校舍普遍不足，教学设备缺少，陈旧落后，公用经费太少，地方院校尤其突出。而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这方面的问题也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所以我们说困难还很多。这些困难都是客观存在的，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但是应该看到形势好是主流，是本质，困难是暂时的，不是不可克服的。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高，我们的任务很重，我们应该知难而进，勇往直前，努力开创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二、高等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高等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里讲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

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根据小平同志这个指示，我们高等教育工作的根本的指导思想也应该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体系，来很好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具体地说，有这么几点：

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这就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善和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高等学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强阵地。这一条是讲的政治方向。如果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是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

第二、要从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情出发，努力使高等教育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有益的经验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总结和创造我们自己的经验，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

第三、采取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种形式、有计划、按比例、持续地发展高等教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是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的。我们培养人才的计划要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计划相适应，应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培养人才。同时也应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来作为补充。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有个统筹规划，全面安排，使招生人数能持续上升，防止大起大落。

第四、不断提高各类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应该符合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符合我国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还要考虑到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后应该具有在国际上竞争的能力。这就要求各类高等学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防止只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现象。同时，根据目前我国各方面对人才的需要和办学条件，对于高等学校的质量要求不能一刀切。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分别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规格、不同的修业年限来规定不同的质量要求，使各类学校，各按步伐，各有特色，共同提高。在发展中必须注意切实办好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学科，使他们成为高等教育事业的骨干、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

第五、坚决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旧立新，改革一切束缚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规章制度。高等教育的改革要和经济、劳动、人事方面的改革相结合。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进行，要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多出人才，多出科研成果；要有利于教职工队伍的建设，使他们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首先做好本职工作；要有利于发挥中央、地方、社会、学校各方面的积极性，用比较少的人力、财力、物力取得较好的办学效果；要有利于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和管理制度；还要考虑到和中、小学的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相衔接。改革要从教育的特点出发，不要生搬硬套经济领域的做法。重大的改革要经过试点。对群众的首创精神既要爱护支持，又要善于引导。

对于教育部提出的这些意见，到会的同志都是同意的。大家认为进一步明确这样一些指导思想，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但对怎样把这些思想表述得更精确、更简明，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会议还讨论了今后三、五年内高等教育的工作方针。经过讨论，明确今后三、五年内高等教育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加快调整、改革的步伐，继续进行整顿，加速发展数量，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有的报纸报导这次会议时，没有把这几句话全面报导。我们应该全面理解这几句话。调整就是要使各种比例关系理顺。从教育的外部关系来看，就是要进一步解决教育和经济建设比例失调的问题，也就

是要把教育往上调。从教育的内部关系来说,就是要调整科系、专业的比例失调,解决结构、层次不够合理的问题。这次会议根据紫阳同志的意见,大家明确了这样一个思想,要把发展和调整结合起来,不是等调整好了再发展,而是要在发展中进行调整。现在本科多,专科少,在发展中就要多办一些专科。现在财经、法律、管理、应用性文科少,在发展中就要注重发展这些为建设所急需的短缺专业。这样就可以通过发展来调整比例关系。所以我们说这种调整,是积极的调整,是为了更好地有计划、按比例地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通过发展使高教的结构和层次逐步趋于合理。发展不是盲目发展,不是使长线越来越长,短线还是短线,而应通过发展来调整。我们要以改革来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数量,提高质量。也就是说,为了使高等教育能够发展的更快一些,并不断提高质量,就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内容是很多的,就象这几年发展起来的短期职业大学就是一种改革。这次会上南京的金陵职业大学发了言。我们在武汉时都去参观了江汉大学,它也是一所职业大学。这种短期职业大学有五个特点:短期、职业、走读、收费、不包分配,这些都是一种改革,这种改革使得高等教育能够更快、更多地为地方上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同时也可以更多地满足青年的升学要求,实践证明它是有生命力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通过改革可以发展数量。我们也要通过改革来提高质量。会上用了不少时间来讨论八字方针和发展的关系,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它们是互为条件,是互相促进的,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应该把它们互相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由于各地、各校的情况不同,各个时期的工作的侧重点可以不同,但是总的来讲是要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并且把这几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三、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问题

这次会议认真讨论了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明确了以下几点:

1. 进一步提高了对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迫切性的认识。到会的同志由于事先没有看到国务院的文件,不少人开始时对加速发展教育思想准备不够。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为了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建设的宏伟奋斗目标,在本世纪末使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各条战线、各个地区都深感专门人才缺乏,都迫切要求教育先行。由于人才培养的周期长,所以八十年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要考虑到国家八十年代的需要,而且要积极为九十年代的经济振兴做好准备。实际上,今年招收的学生毕业时已经是八七年、八八年了,还要经过几年才能适应工作,也就到了九十年代了。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加速发展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全局来认识。就是说如果从现在起,我们再不抓紧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误国家大事。

2. 关于加速发展的初步设想。教育部提出,经过努力,在保证必要的办学条件的前提下,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数在八十年代大体要增长1.5倍。1980年招生28万人,到1985年要发展到45万人,到1990年发展到70万人。在校大专学生的人数要从1980年的114万人,发展到1990年的230万人,和现在日本的大学生人数差不多。同时,其它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即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职工大学、农民大学等等,在校学生人数将由1980年的46万人发展到1990年的300万人左右,增长5.5倍。普通高等学校和另一条腿加起来,到1990年要达到500万人左右,和现在苏联的高等教育规模差不多。1985年全国将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二万人左右,到1990年招4万人左右,在校学习的研究生总数达到10万人左右。这是指的全国总的奋斗目标,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地方、每一所学校都一律一刀切的翻多少

番。有的地方，象西藏，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发展普通教育，要在发展普通教育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发展高等教育。因此，各地、各校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个设想是不是可能实现呢？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是要经过很大努力才能实现的，但还是有可能的。因为经过几年来的恢复、整顿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只要各地方、各部门党政领导真正重视了，多拿出一些钱来办教育，切实保证办学条件；只要我们教育部门能够很好地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方针搞对头，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工作做好，把各个方面办学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实现上述设想还是可能的。

3. 怎样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会上大家总结了过去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讨论了加快发展的措施。教育部提出了八条措施，我想突出讲两个方面：

第一、要充分发挥现有高等学校，特别是老校的潜力。老校应适当地扩大规模。现在，由于各种原因，有相当一批老校，并没有达到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最大规模。办学校的规模过小，同样要一套干部、教员、设备，但是培养学生少，经济效益是低的。现在全国有715所高等学校，平均每所学校只有学生一千多人，一般规模都较小。当然规模过大也不便于管理。另一个措施就是从老校分出一些教师、干部，采取老校“下蛋”的办法来办新校，办分校。发展高等教育也有两条路子：一条是老校挖潜，一条是再去铺许多新摊子，这是两种不同的做法。大家觉得还是老校挖潜这个路子投资省、上得快、又能够保证质量。老校一般师资力量比较强，设备条件也比较好，是有潜力可挖的。但是由于办学条件不配套，有的缺房子，或缺经费，或缺某部分师资，使潜力不能充分发挥。例如人民大学潜力就很大，现在由于缺校舍，潜力远远未能发挥。因此，只要在办学条件上加以充实和填平补齐，就可以把潜力挖出来。不少老校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校舍被占，至今没有归还，以致妨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会上大家又一次强烈呼吁要切实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些老校，受了部门所有制的限制，也影响了潜力的发挥。有些业务部门所办的学校，有一部分专业和它的主管部门不对口，虽然这种专业社会很需要，但是主管部门没有积极性来发展这些不对口的专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几年创造了一条经验，叫做“委托培养，联合办学，”即属于某个地方、某个部门管的大学，如果还有潜力，可以接受别的地方、部门大学的委托，由要人的地方、部门提供经费，为它们培养人才。经验证明，这是一条投资省、见效快、质量有保证的路子。教育部草拟了一个“高等学校接受委托培养人才的试行办法”，绝大多数同志都是赞成的。会上有的同志谈到过去有些学校下过“蛋”，但是“蛋”都丢了，没搞成，或者没搞好。这方面经验教训很多，需要总结。大家都知道，只有把老母鸡养好了，它才能下出好的蛋。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应该把老校这个骨干保存好，不应该把它拆散，甚至破坏它。过去把老校搬到偏远的、不利于学术文化交流的地方，甚至拆成几个学校下放，是失败的经验。我们应该把老校这个老母鸡养好，不要让它伤筋动骨，而要帮助它不断地生长出新的力量，以多余的师资、干部支持新建校。老校与地方联合办学，是个好办法，老校主要是出教师、出干部，地方上解决基建、投资，为地方培养人才，这样两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了。会上浙江大学介绍他们和杭州市合办了一所杭州工业专科学校，三年制，浙大出人，杭州市出房子、出钱，很快就建成了。

浙大有雄心壮志，要把这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办成全国第一流的工专，它也完全有这个条件。大家还谈到，老校分出一部分干部、教师去办分校，还可以解决老校本身队伍结构不合理、人才积压的问题。现在不少老校中年教师密度过大，而学校编制有限，这样会妨碍队伍的更新。大家担心将来会出现“同步老化”，很多教师都同时进入退休年令，而新的人接不

上。如果从老校里头分出一部分力量去支援新校或者办分校，对于老校本身也有很大的好处。当然，必须新建的学校还要建，但新建一所高等学校并不那么容易，没有一定的时间，不容易建成。许多同志还指出今后不应再多建单科性的学校，更不宜从综合大学中分出一些系去办单科性的学校，因为这样不利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在综合性、多科性的大学里，各门学科可以相互渗透、相互交流，这样对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有好处。

第二，要坚持采取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形式来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教育部提出要提倡大城市、经济发展较快的中等城市、大企业、大公司举办高等专科学校或短期职业大学，为本地区、本单位培养人才。湖北省今年准备在襄樊、沙市等城市办几所这样的大学。江苏省已经办了四所，还准备发展到八所。这些省辖市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短期职业大学就办什么样的专业。我们认为应积极提倡这一种办法，也要鼓励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爱国人士举办这一类学校。再就是要大力发展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等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扩大它的招生规模，增加财经、政法、应用文科等国家急需的专业。我们电大开始办的是工科专业，现在看，电大办文科专业条件更有利一些，现在正在逐步上。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要逐步建立教育电视台。将来这一类学校，除了继续培养在职职工、中小学教师以外，也可以吸收社会青年参加学习，以培养更多的人才。总之，大家认为发展这一条腿，采取多种形式、多规格、多层次办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苏联现在五百万大学生，其中40%是函授生。到1990年，我们将有五百万大学生，其中三百万人也要靠另一条腿来培养。所以会上，大家认为要充分重视和支持这一条腿，而不应该轻视、看不起这一条腿。这样做，可以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使教育事业能够蓬勃地发展。这次会议吸收了多种形式的高等学校的代表来参加，他们很高兴，觉得这是真正承认了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也更加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他们那个组主要提了几条意见：呼吁各方面要进一步重视多种形式办学，包括普通高等学校办函授、夜大学，要求各个领导部门进一步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希望普通高等学校加强对他们的支援。他们是可以少花钱多办事的，但不是不花钱就能办事。所以还需要解决他们办学条件。

教育部提出的措施还有：高等学校要举办一些干部专修科，承担培训提高在职干部的任务；要提倡走读，从今年招收新生开始，凡家在学校所在城市，离学校又不太远的学生，一律实行走读。城建、商业、交通等部门要想方设法为走读生提供方便。我们也在考虑为家在农村、外地的不能走读的学生集资兴建学生公寓；还有，要积极鼓励青年努力自学成才，普遍推广自学考试制度，这些我就不展开讲了。

4. 必须重视教育质量。有些同志提出现在要加快发展，会不会重复五八年大办“红专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大办“七·二一”大学、“朝农”时类似的情况呢？在加快发展的时候，怎样保证教育质量的提高呢？会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不少同志指出，在“国家要人才，青年要上学，干部要学历”这样一种形势下，如果我们忽视质量，不坚持必要的标准，是可能出问题的，有些同志有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既不能忽视质量，也不能对质量的要求一刀切，盲目地都要向重点大学看齐。每一类学校、每一个层次、每一种规格应根据不同的要求和自己的特色，努力保证应有的质量。要采取有力的措施，逐步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学科，使它们成为教育和科研的中心，除了为国家培养水平较高的本科生以外，还要努力培养出一批相当于国际先进水平的硕士、博士生。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制度。研究生的培养，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积极稳步地发展数量。重点学科是重点大学的基础，只有建设好一批重点学

科,才能够办好重点大学。但重点大学的每一个学科并不一定都是重点学科,非重点大学的某些学科也可以是重点学科。因此,不仅要建设一批重点大学,还要建设一批重点学科。要优先保证重点大学、重点学科的师资、校舍、设备、图书等办学条件,并且要求他们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次还提出:要建立定期评定重点大学、重点学科的制度。由有关方面的专家、教授、领导干部组成评议委员会。设想1985年或86年进行第一次评议工作。这也是近年来许多人提出的意见,主张重点大学不要光是由领导上来指定。大家知道,现在的重点大学还是78年定下来的,当时定的数量比较多,现在已经有90多所重点大学。还有一些省和部门在不断地要求把自己办的学校列为重点,但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力量,重点大学多了,实际上成了“重点不重”,不能真正保证他们应有的条件。也有些重点大学并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大家不太服气。所以,许多人主张采取评定的办法,谁的工作做得好、贡献大,谁就被评为重点大学,我们想朝这个方向来做。我们认为,在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时候,如果能够保证一批重点大学不断地提高质量,就可以带动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事实上,多种形式办学在各个方面都要依赖老校的支援。

多种形式办学是否能保证质量?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的质量怎么样?现在看,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是可以保证一定的质量的。这里一是要把住入学考试、期末考试、毕业考试这几个关,学生入学不能走后门,要经过考试,毕业也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这是保证质量的一个重要条件。一是要有必要的办学条件。因为有老校在师资、教材、实验室等方面的支持,所以现在的电大、夜大、函大、短大等多种形式的大学,教学质量大体上是好的。在这些学校工作的同志们也很重视教学质量的问题。他们在讨论中提出,多种形式办学,质量是生命线,如果质量不好,学校就站不住脚。

质量必须是全面的,包括德、智、体各个方面。这几年,大学生的思想是有进步的,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就拿毕业分配来讲,真正有献身精神的人还不很多。讲实惠,不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不愿意离开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家,这些思想还是大量存在的。因此要十分重视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看到,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样一种形势下,给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也可以说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只有文化,而不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努力为社会主义服务,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侵蚀,没有抵抗能力,那么我们的教育就是失败的。

普通教育的质量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普教上不去,高教也上不去。因此不能孤立地研究高等教育,而应该和普通教育联系起来研究。要使我们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就是说要通过提高普通教育的质量,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了,反过来又能为中学培养、输送更好的教师,提高普通教育的质量。要提高普通教育的质量,根本的问题是要提高师资水平,这就涉及到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所有师范院校都应该把提高学科水平和为中学服务、提高中学水平这两项任务很好地结合起来。所有的高等学校都应该关心普通教育,支援普通教育,尽可能帮助他们的教师进修,帮助他们编写教材,把多余的图书设备送给中小学。

5. 关于调整改革高等教育结构的问题。首先,要下决心抓紧搞好今后十五年,即1986—2000年的专门人才需求预测和培养规划,作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依据。会上,上海市和航天工业部的同志介绍了他们搞人才预测的经验。他们认为搞和不搞大不一样。人才预测要搞得非常准确是很困难的,因为涉及很多因素,但是即使预测只有60—70%的准确性,也比不预测、盲目地培养人才好得多。

在发展中，我们要逐步调整本科、专科的学生人数的比例，力争在1986年将普通高等学校中专科招生的比重提高到30%以上。“七·五”期间，将继续提高专科招生的比重，这样可以更快、更省地培养人材，况且有一些工作岗位并不需要长学制培养的人。

要调整高等教育内部各门类、专业的比例，逐步扩大经济管理、法律、应用性文科等专业的培养规模，使它们的招生人数有比较大的增长。理工科本科的招生人数，绝对数还会有某些增加。但它们在各科招生总数中的比重要适当地降低。农林、医药、师范、体育、艺术等科暂按原比例招生。所有的门类都要注意发展短缺专业。面向国防工业的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要正确处理专用与通用、军用与民用的关系，实行军民兼顾。面向国防工业的学校，如果有潜力，要积极接受委托培养任务。有条件的综合大学和多科性的工业、农林院校也可以创造条件，增设管理等应用性的文科专业。要力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各科学学生人数的比例趋于协调，大体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院系调整以后，我们的综合大学变成了只有文理科。现在有人提出要试办一些各门学科都有的综合性大学。我们认为，个别高等学校可以试办设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等多种学科和专业的综合性大学。目前，如果许多大学都要办这种大的综合性的学校，条件还不具备，因此，除个别大学试办外，可以积极发展校际间的协作。

教育部计划在1983年、1984年这两年内，重新修订普通高等学校的专业目录。要根据各项建设事业的实际需要，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设置专业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国外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的有益经验来修订，解决专业划分过细、知识面过窄的问题。口径过窄的专业必须放宽或者与相近专业合并。对于某些确实供过于求的专业，可以改变专业方向，或者撤销合并。一时看不准的，可以减少招生，或者隔年招生。有的可以延长学制，扩大专业的适用范围。像外语中的小语种，可以延长一年学制，兼学一个通用语种。

在讨论发展高等教育的问题时，大家还提出，这几年我们有些毕业生并没有能够分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学校辛辛苦苦地培养了几年，分配时却有学非所用的，有优才劣用的。有的同志说，现在不是后继无人，而是后继乏位，即缺乏位置。这涉及人事制度需要改革，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编制已经满了，但是，很多在职的人又缺少专业知识的现象。教育部考虑，要把情况很好地摸一下。要很好地调查了解近几届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使用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总结毕业生分配工作的经验，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改革毕业生的分配办法，也为改进高等学校的培养工作提供依据。准备从省、市、部门、学校里集中一批人，搞两个月的调查。

四、关于改革的问题

十二大以前，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贯彻八字方针也是以调整为中心。十二大以后，形势发展了，耀邦同志把改革问题突出地提出来了，而且指出这是关系四化成败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也在开始动。要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非进行改革不可。我们建国以来有过两次改革，一次是五二年，那一次主要是学习苏联；一次是五八年，我们想走自己的路，但是，当时有“左”的思想干扰。这一次改革，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使教育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相适应，形成中国的特色，难度就比较大。它的广度和深度也是空前的。因此，我们觉得首先还是要解决改革的指导思想问题，使改革能够健康地进行。

耀邦同志提出要从实际出发，全面而有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紫阳同志在春节

团拜会上又加上了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改。改革就是要改掉那些不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不适合我们国情的，也包括不符合教育规律的东西？这样，才能够加速教育的发展，提高教育的质量，使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所以，首先是要坚决地改。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中央有关改革的指示同教育战线的实际、教育战线的特点结合好。

高等教育有些什么特点？高等学校是造就新一代，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因此，改革必须坚持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进行。刚才我讲到的中宣部那个文件，就强调了这一点，强调要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跟各项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注意防止和纠正使精神产品脱离精神目的而盲目地商品化的做法和说法，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防止满脑子就是钱，把人的思想境界降低了，直接、间接影响下一代。学校后勤的改革应该可以走快一些，但问题也很复杂。学校的后勤是为师生员工服务的，要把责任制搞好，调动后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但决不能把人的思想引导到主要考虑钱，不能因为改革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特别是学生的利益。还应该指出，学校培养人才的周期长，教育改革的成败是不容易一下子就做出结论来的，不象工农业生产，改革的好坏很快就可以在生产上反映出来。因此，教育改革就需要慎重，多做一些研究工作。如果改的不对头，当你发现它的后果时，往往已经是难以挽回了。学校一搞乱，再恢复就需要有比较长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注意教育的这个特点，还是要看准了再干，看不准就试。试验成功了，就叫做看准了，试验没有成功，就是没有看准，这是实践论的观点。当然试验中间允许失败，允许出一些毛病，否则大家就不敢动了。总的来说，我们希望学校工作能够持续地前进，不要出现大的折腾。因此，既要勇于改革，又要善于改革。

高等教育的改革内容很多。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着重研究了管理制度的改革。在这一方面，少数学校已经进行了一些试验，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从上边来看，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改革，现在还处在酝酿阶段，大多数学校还没有动，还没有真正全面系统地展开。这次会议因为时间的限制，对高等教育的改革讨论得不很充分。对于改革的指导思想，大家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还没有深入研究。

关于改革，这一次主要谈到哪些问题呢？我只能简单地讲一讲。

1. 改革高等教育的领导管理体制。这是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克服目前高等教育领导体制上管理权限集中过多的缺点。今后，教育部除必须集中统一管理的重大问题以外，要逐步扩大地方、部门和学校的管理权限，以利于调动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同时，这样做也可以使教育部克服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管的事情很多，结果大事就抓不住了。今后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部主要负责这几方面的事情：（1）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法令；草拟教育方面有关的法律、法令；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2）制定全国性的长期发展规划、年度事业计划。（3）制定各类高等学校的修业年限、培养目标和专业目录。（4）制定国际教育的交流方针、政策、计划和制度。（5）检查执行情况，总结和交流经验。（6）直接管理本部所属的高等学校。

同志们问教育部今后对地方高等院校怎样加强领导？我想，教育部对地方院校的 leadership 主要是通过贯彻方针、政策，教育立法，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和总结交流经验来体现。这一方面过去我们做得不够，今后要改进。教育部也希望今后直接管的学校要少一点，这样才能对整个国家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多管一些。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规模日益扩大，要求地方对于高等教育加强领导，要健全领导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充实力量，加强领导和管理。扩大地方的职权，这是个总的趋势。扩大职权也需要创造条件。有些地方、有些学校，各方面条件好

一些，职权就可以更多地下放。过去凡是新建、停办、调整三年制或三年以下的高等学校，都是经教育部审查以后报国务院批。今后改由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报教育部、国家计委备案。但是，新建学校或新建专业，都要做好人才需求预测，毕业生确实有分配的去向，要布局合理，办学条件也要有必要的保证，而且这些都应经过专家论证。教育部要拟定审批新建高等学校、专业的一套办法。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盲目性，防止降低质量。

2. 扩大高等学校的管理权限。高等学校在遵守国家政策、法令和制度，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培养人才、科研任务，并在国家核定的人员编制、基建投资和经费预算范围内，可以行使下列权力：

第一、接受委托培养学生，自行承担科学研究任务和业务服务。

第二、根据国家制定的培养目标，制定本校各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处理其它教学业务问题。

第三、包干使用教育经费，自行安排使用本校各项资金，结余不上缴。现在财政系统下来的各种条文很多，要实行这一条实际上很难，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第四、选任教师、录用职工、进行奖惩。领导班子健全的学校，可以任免系、部、处级及以下的干部。

第五、在完成国家安排的对外活动以外，经过有关部门统筹安排，可以开展国际教育、科研交流活动，使用所得的外汇。对外活动要由有关部门统筹安排，是因为外事方面还有各种比较复杂的情况。

此外，有条件的学校，经过批准，可以试行教师聘任制。少数有条件的重点学校，经过批准可以审批副教授职称，其中有条件的重点学科可以审批教授职称等等。关于扩大学校的管理权限，专门有一个文件，还要进一步修改。

3. 改进学校内部领导制度。要通过实践，逐步完善高等学校内部领导制度。改善学校的内部领导制度，有三方面的目的、要求，一是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二是要发挥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教职工，特别是教师的积极性。

根据党章规定的原则，高等学校应该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系主任负责制。有一部分学校主张设立一种起咨询作用的校务委员会。我们认为可以试行。总的精神是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要适当分工。校党委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思想政治领导，加强对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一定范围的党政干部。有关教学、科研、人事、后勤等工作都由校（院）长负责。校（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也要做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结合业务工作的思想政治工作。系主任对校长负责。系的党总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的工作，对全系工作的正确完成起保证监督作用。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党政分工没有搞好，党组织还是管了较多的行政事务，影响了思想政治领导的加强。

4. 分批做好高等学校的五定工作，实行定编。高等学校五定工作，就是定任务、定专业、定学制、定规模、定编制。这是实行高等学校计划管理的基本措施。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学校的现有基础，争取在1985年前，分期分批完成各校的五定方案的审定工作。条件成熟的学校，可以同时确定五项内容。条件不成熟也可以先把办学的方向、任务、近期要达到的规模，以及一些基本的专业确定下来。这样才能够有一个根据来核定1985年的

人员编制。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普通高等学校人员编制和机构设置的暂行规定，准备征求意见修改定稿后再发下去。各校应该按照这个规定，认真做好各类人员的定编工作，除特殊情况外，争取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逐步达到定编要求。按照这个规定，学校可提前两年准备师资。就是说，85年可以按照87年的学校规模来确定人员编制。为了达到规定的人员编制，就要制定逐年减少超编人员的方案。要下决心，采取多种办法，多种渠道，妥善安排多余的人员，促使人才按照合理的方向流动。最近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正在草拟一个《关于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若干意见》。合理流动就是指从城市流向农村，从大城市流向中小城市，从内地流向边远地区，从科技人员相对富裕的部门和单位流向科技力量薄弱而又急需加强的部门和单位。我们不一般地提人才流动。西南、西北地区最怕一般地提人才流动，因为一提人才流动。就会出现“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因此，现在的提法叫人才合理流动。我们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来促进科技人才按合理的方向流动。这就需要采取一些政策上的措施，一些适当的优惠措施。这个问题，现在正在研究。在这次会议上也提出了几条意见。但是这件事情做起来是比较难的，要注意不要引起知识分子的波动。这件工作各个学校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逐步地来做。会上提出的几条意见是：（一）对多余的教师先在校内调剂使用，加强实验室、图书馆、资料室和其它单位。（二）调整一部分教师到师资力量薄弱的高等学校，或者调一批教师和干部去办分校，有的也可以支援中等专业学校和其它中等学校。（三）采取正式调转、短期借调、定期轮换等方式，组织教师支援边疆和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的教育事业。（四）利用大学的知识优势，对尚待安排的教师和职工进行系统培训后，有计划地输送到校外单位，重新分配适当工作。（五）对一时不能向校外流动的多余人员，除进行培训外要有组织地吸收他们参加对外服务工作。对于人员合理流动的问题，要有决心，党内外、上下要统一认识，同时工作要做细，步骤要妥善，政策上要有一些优惠的办法来鼓励。在工作上还要得到当地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这件工作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老校教师队伍就没有办法更新，再过若干年以后老校就没有生气了。要看到这一点。人才合理流动的工作必须要做，并使它和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支援国家各方面的建设事业结合起来。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还不要扩大宣传，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不要搞得人心惶惶，而又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五、建立岗位责任制，逐步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

各校对于干部、教师、职工都要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建立适合学校特点的岗位责任制和考核办法。现在难就难在要搞出一个适合学校特点的岗位责任制。学校里有职称，这几年，评定职称对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了好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普遍地存在的是讲人情、照顾、论资排辈，等等。因为把职称和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联系得很紧，有的单位甚至把这件事情当成福利工作。对现行的评定职称的办法，需要总结实践经验，加以改进。首先要进一步明确评定职称的目的、意义，不能把评定职称仅仅看成是为了个人得到某种生活待遇。建立职称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促进教师队伍建设和提高教师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鼓励大家在政治上不断进步，业务上不断提高，工作上多作贡献。同时更加合理地使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关系到国家教育科学事业发展的重大事情。一个国家的高级职称还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学术理论水平和科学成就。所以首先要明确评定职称的目的和意义。职称和待遇当然是有联系的，但现在挂钩挂得太紧，什么都和职称挂钩，连订牛奶、买豆付等也都和职称挂上钩，这就造成一种情况，好象有了职称就有了一切，没有职称就丧失

一切，这样就容易造成职称的贬值。是否可以考虑，评定职称从严，而在工资、待遇方面放宽一些。有的教师教龄长，工作上也有贡献，但是学术水平不高，可以在生活待遇上给予相应的待遇，不一定就送他一个高级的职称。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要求大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过去我们评定职称的标准，弹性太大了，很难掌握。现在考虑，应该结合不同教研室、不同工作岗位的具体情况，拟定评定职称的严格、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还是比较具体的、严格的，不能作别的解释的。这样才好掌握，才能真正作到全面考核，择优提升。为了取得改革的经验，教育部已经组织七所高等院校进行关于评定职称工作的改革试点。高等学校教师的生活待遇，主要要靠国家改革工资制度来解决，而不是靠个人去找出路，去搞什么第二职业。只有这样才能鼓励教师把精力真正放到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术水平上来。首先，要逐步使各类人员的工资达到其职称的最低工资等级线。有一次紫阳同志分析了知识分子工资待遇的问题。他说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已经下降了，建国以后，有一种思想叫做防止出现高薪阶层，要求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知识分子的工资更加低了，经过“文化大革命”就更低了。这几年，虽然很多人连续提了级，但还有不少人仍然达不到最低等级线。因此现在想首先要使教师达到其职称的最低工资等级线。然后再逐步地适当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差别。做到这第一步可能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学校里想一些办法，筹措一点学校基金，开辟一些渠道，在可能的条件下改善一下教师的待遇，是可以理解的。教师在认真完成校内本职工作之后，有余力，可以组织起来开展对外服务，也可以经过学校同意，到校外兼课兼职。但是必须妥善处理完成国家任务和承担社会上各种协作任务的关系，切实保证教学质量和完成国家的科研任务。在收入的分配上，既要有利于促进学校主要任务的完成，又要有利于调动有关人员的积极性。

关于工作量制度也需要总结实践经验加以改进。因为脑力劳动的工作量是很难计算的。现行的关于计算工作量的办法，还不能科学地反映脑力劳动的量，更难以反映脑力劳动的质。而且计算方法很繁琐，似乎一个人干点什么都得计算工作量。有些事情是提高教学质量所必须的，如深入学生了解情况、制作教具、研究教学方法等等，在计算工作量时往往没有考虑到，这样就没有人愿意做了。所以，工作量制度也要进一步研究，到底怎样搞才好。我以为计算方法要简化。同时，不能设想由教育部制订一个办法，就能套到所有的学校、所有的教研室，这是不可能的。我个人认为将来教育部可以只控制一个学校的编制，在这个编制范围以内，各校怎么去考核教师的工作，计算教师的工作量，可以由各校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不同的系、不同的教研室，制订具体的办法。这个问题还需要大家一起进一步研究。

我们考虑，今后高等学校留用青年教师，要争取多补充毕业研究生，近几年也可以适当选留一些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在国家的人事制度没有全面改革之前，我们想从1983年起，凡是分配到高等学校任教的本科生，要实行见习、试用一年的制度。就是要有试用期，过去叫见习期，现在叫见习、试用期。试用一年以后，考核合格就转正定级，不合格的可以另行安排工作。我们还考虑，在有条件的重点大学，对于转正以后的教师实行一定年限的聘用制。就是对助教规定一定年限的聘用期，在规定的年限以内，如果不能升讲师，就要实行流动；讲师多少年升不上副教授，也要实行流动。大家觉得这样考虑是合理的。我们多少年来是铁饭碗，不管水平怎么样，没有一个淘汰，这就影响了教师队伍的质量。对现在已经在岗位上的，要采取妥善的办法来安排，因为这个问题是历史上各种因素造成的。今后则要严格起来，想采取上述的办法来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会上有一个专门的文件讲到师资队伍的调整

和管理改革，这些问题比较复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六、试行人民奖学金制度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们认为主要是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但助学金的办法也需要改进，要改变目前人民助学金和学生本人的思想品德、学习成绩脱节的状况。打算先将现行的人民助学金实施办法改为人民奖学金和人民助学金并存的办法，从1983年秋季入学的新生开始，实行这一新办法。这就要适当减少领取人民助学金的人数，拿出这部分钱用作人民奖学金。以前入学的，基本上仍按原来的办法执行，以免引起波动。个别别人表现不好，学习不努力，成绩也不及格，也可以不再发给他助学金。在这次会上，大家原则上同意这个办法。

七、改革后勤工作，推行经济责任制的管理办法

高等学校后勤工作要在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态度、更好地为师生员工服务的前提下进行改革，逐步建立后勤工作岗位责任制和符合学校特点的经济责任制的管理办法，使学校生活管理逐步社会化。这次会上，合肥工业大学介绍了他们改革后勤工作的经验。他们的经验主要是组织劳动服务公司，把很多后勤服务工作交给实行集体所有制的劳动服务公司承担，这样既解决了学校的待业知识青年就业的问题，也方便了学校的教职工。我们积极支持这方面的改革试验，并希望不断地总结、完善。

在各项改革中间，首要的是机构改革，调整好学校的领导班子。这是一切改革的前提。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就没有办法去领导学校的各项改革。所以搞好学校的各项改革的关键所在，是要调整好学校的领导班子。为了调整好学校的领导班子，中宣部和教育部党组共同发了一个文件，根据中央关于调整领导班子的指示，结合高校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意见。在这次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曾德林同志专门有一个发言，讲到调整领导班子的问题。高等学校是有人才的。最近一两年，党和政府从高等学校干部、教师中间已经抽调了将近四十个人进入了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班子，和担任中央党政部门的领导工作。我们认为，高等学校完全可以立足本校，眼睛向内，眼睛向下，来解决调整领导班子的问题。要大胆放手地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的一批骨干中选拔德、才兼备，适合做领导工作的干部和教师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除了抓紧校一级领导班子的调整以外，还要重视中层领导班子的调整，抓好中层领导班子的建设。学校里有不少有才干的中层领导干部，如果本校安排不下，可以支援外校、新校，有的还可以提拔为校级领导干部。高校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今年年底以前要全部结束，工作应做的扎实细致，不能草率从事。希望经过调整，使各个高等学校的领导班子真正成为政治上、业务上都是强有力的，能够开创新局面的班子。

东昌同志在总结里还讲到，高等教育要加速发展，要调整，要改革，这一切任务都要落到学校的干部、教师身上，所以学校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很好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干部教师的积极性。最近中央组织部和文献研究室编了一本书，叫《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这个《选编》记录了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指导思想，对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的左倾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历程，科学地阐述了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针政策。我觉得这是干部进修班应该很好学习的一项内容。昨天在教育部党组会上，谈到我们办的干部进修班应该很好地学习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许多重要的文献。这些文件虽然我们平常也在学，但是，系统、全面、深入地学习不够，很有必要认真学习这些文件。教育学、心理学等也要学，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好。这是我们工作中

的指导方针。我想，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首先就要很好学习有关的文献，使自己的思想和中央完全一致起来。现在，有一些高等学校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上还是有阻力的，应该很好解决。再就是要在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方面很好地关心知识分子，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东昌同志特别讲到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培养出来的一百六十多万大学毕业生，现在都是学校各方面工作的骨干，但是现在身体不好的情况是比较突出的。他很耽心到一九九〇年就会有许多人陆续丧失了工作能力，过早地就依靠不上了。怎样保护好这些同志的健康是一件符合国家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事。不久前中央转发了国家科委党组《关于中年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报告》，要求在目前条件下，采取一些紧急有力的措施，保护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包括检查身体，改善医疗条件；逐步改善住房条件；使他们过好假期，使他们工作的时间能更长一些，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一些。我们应该努力把这些工作做好。